



护国战争与贵州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贵州史地小丛书

护国战争与贵州

顾大全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叶光大
封面设计 石俊生

贵州史地小丛书
护国战争与贵州
顾 大 全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60千字

印数1—2,050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1115·82 定价: 0.64 元

贵州史地小丛书 编委会

主 编
编 委

周春元 张英骏
侯哲安 曾昭毅
李良骐 孙成章
熊书益 郝文征
刘 榕 沈子英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为贵州史地小丛书的一种。

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窃国大盗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帝位，准备次年元旦登极，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。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云南爆发护国起义，次年一月二十七日贵州率先响应云南起义，滇、黔成为护国反袁战争的策源地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反袁斗争，把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袁世凯掀下了皇帝的宝座。本书概述了护国运动的前前后后，以及贵州人民在这场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中的英雄事迹，这是贵州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最光辉的贡献。

引 言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窃国大盗，其人就是袁世凯。

袁世凯（1859—1916）字慰亭，别号容庵，河南项城人。他出生于一个大官僚、大地主家庭。早年因出卖维新派而邀获慈禧太后的宠信，从此青云直上；接着以残酷镇压义和团和勾结帝国主义，为清王朝立下勋劳而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一九〇五年，北洋军练成六镇（镇相当于现在的师），共约六万多人。袁便一跃而成为清朝末年统治阶级中，掌握大量精锐武装力量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后，清王朝面临土崩瓦解，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，出任内阁总理大臣，掌握了军政大权，于是以武力向革命派疯狂反扑，接连攻下了汉口、汉阳，而陈兵长江，一面逼迫清朝皇帝退位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，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，

在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。

临时大总统的职位，并不能满足袁世凯这个心怀奸诈而野心勃勃的封建余孽的权势欲。为了把中国变成一家的天下，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掀起了一股复辟封建帝制的逆流，顿时中国天空上露出的一线民主曙光又被黑云遮没了，使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又出现了一次大的倒退。历史的潮流在前进中尽管有时会出现曲折，但辛亥革命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而不可阻挡。袁世凯妄图扭转历史的潮流的所作所为，一旦暴露出来，就立即受到全国各阶级、各种政治势力，以及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、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运动，波澜壮阔地席卷全国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震惊中外的护国起义首先在云南爆发，开始了反袁护国战争。次年，一月二十七日，贵州率先响应云南独立，滇、黔联成一片，成为护国战争的策源地。之后，护国战争推动了全国性的反袁斗争，各省纷纷独立。袁世凯这个不可一世的窃国大盗，在全国齐声喊打中滚下了皇帝的宝座，一命呜呼，结束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王朝，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

力，使民主共和进一步深入人心。这是历史的辩证法的胜利，民主的胜利，人民的胜利。

《护国战争与贵州》一书，概述了护国运动的前前后后以及贵州人民在这场捍卫民主共和、反对复辟帝制的运动中的英勇事迹，贵州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的种种表现。这段历史是贵州人民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光辉的贡献之一。

目 录

引 言	(1)
一 窃国大盗当皇帝	(1)
二 土豪变成护军使	(11)
三 反抗烽火燃遍神州	(18)
四 孙中山高举讨袁义旗	(23)
五 梁启超与蔡锷密谋反袁	(30)
六 云南首举护国旗	(39)
七 刘显世暗中助袁	(48)
八 黔中军民酝酿举义	(54)
九 举义旗贵州独立	(63)
十 护国军大战川南	(68)
十一 棉花坡朱德立功	(76)
十二 进攻川边黔军大捷	(82)
十三 东路黔军战湘西	(90)
十四 黔中人民热情支援护国军	(100)
十五 一枕黄粱袁贼呜呼	(105)
结束语	(116)

一 窃国大盗当皇帝

辛亥革命之后，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，继而正式大总统，但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所留下来的国会、《临时约法》、责任内阁三大成果，在形式上还保存着，这些都被袁视为独裁专制的障碍。他把国民党视为妨碍其独裁的异己力量，对国民党占据的南方六七省地盘，特别眼红。这时，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，为了维护共和，分取袁世凯的权力，便利用国民党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的优势，周游南方各省，到处发表演说，宣扬政党内阁制，并准备赴京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，这使袁世凯十分不安。袁指使特务在上海火车站将宋枪杀。宋案发生后，引起全国一致愤怒声讨。孙中山从日本回国，组织了讨袁的第二次革命。袁世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非法向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的“善后大借款”，充作军费，发动内战，用武力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，

消灭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势力。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，北洋势力深入长江流域，冯国璋坐镇南京，雄踞东南。其他北洋将领：张勋据徐州，倪嗣冲占安徽，王占元督湖北，曹锟第三师守岳州，卢永祥为淞沪镇守使，李纯据有江西，作为袁世凯防范南方革命派的前哨。还派忠实爪牙龙济光、汤芑铭分别统治广东和湖南。至此，袁世凯用武力表面上完成了对中国的“统一”。接着，袁又解散国会，撕毁《临时约法》，另制“袁记约法”，实行独裁专制。在他看来，民主共和制度是不行的，只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才是天经地义的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都是帝王统治的历史。袁把做皇帝视为人生权力、荣誉、享乐的极峰。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胡说“共和办不下去”，越办越糟，“非实行帝制不可”。当资产阶级民主派被清除后，他自以为得了天下，要进一步“应天承运”，爬到极权的顶峰上去，由总统变皇帝。

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时期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际，西方帝国主义忙于在欧洲互相厮杀，暂时无暇东顾。日本帝国主义则抓紧时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，借对德宣战而派兵强占青岛，夺取德国在华权益。袁世凯深知，要复辟帝制，必须首先取

得日本的支持，须对日本的侵略采取退让政策。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也窥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，乘机要挟，以便推行独占中国的计划。一九一五年一月，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。主要内容是：(1)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，并加以扩大；(2)延长租借旅大及南满、安奉两铁路期限为九十九年，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土地、居住、工商经营、开矿等项特权；(3)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，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人开采；(4)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外国；(5)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、军事、财政顾问。中日合办警察与兵工厂。允许日本有建造湖北、江西、广东之间重要铁路之权以及日本在福建投资、筑路、开矿的优先权等。这些条件一旦实现，中国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，派外交总长陆徵祥、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日置益秘密谈判。在谈判期间，日本以“换防”为名，增兵东三省、山东、天津等地，进行武力威胁。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，日本提出最后通牒，限袁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。五月九日，袁世凯除对五号条款声明“容日后协商”外，公然接受日本的要求。

袁世凯的卖国行径，满足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，于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公开赞扬袁世凯说：“关于君主立宪事，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，日本甚愿帮忙一切。”袁世凯得到日本的支持后，加快了称帝的步伐，他采用四年前攘夺总统宝座的故伎，一方面暗中指示心腹爪牙，四处煽动说，要消除国家危机必须建立强固政权，只有实行帝制，才能保全国家。并胡编乱造什么“真龙显形”，“上天垂象，帝星朗照”，其生父袁保中的坟侧生有紫藤，蜿蜒盘绕，形状似龙，一侧是凤，龙凤相配，应出帝王等无稽之谈，蛊惑人心；另一方面，袁又公开装着若无其事，超然事外，矢口否认有称帝之意，在报纸上发表他与冯国璋的谈话，说“自古君主之世，传不数世，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，我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，加之我子孙。”如果有人逼他做皇帝，他就要出走国外，“从此不问国事”。袁世凯这种种表演，却是欲盖弥彰。随着他称帝步伐的加快，袁世凯策划帝制的活动，终于从幕后推到了前台。

一九一五年八月上旬，袁世凯的宪法顾问、美国人古德诺的《共和与君主论》一文发表在政府御用的《亚细亚报》上，为袁世凯帝制丑剧敲响了开场锣鼓。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政治，人民文

化低，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，骤改共和，没有良好的结果。他的结论是：“中国如用君主制，较共和制为宜”。于是，一犬吠影，百犬吠声，袁的走狗们都一齐狂吠起来。接着，湖南人杨度，在袁的旨意下，串联了孙毓筠、李燮和、胡瑛、刘师培和严复，于八月十四日联名发起成立“筹安会”。杨度、严复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，孙、李、胡、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，从表面上看来，主张恢复帝制，不是北洋派的私意，好象是全国界的共同主张。杨度等在筹安会宣言及《君宪救国论》中，大肆鼓吹帝制。杨把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民族危机，硬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，只有把皇冠奉献给袁氏，才能救国家的危亡。这些谬论，道出了袁氏的心声。为此，杨度被袁封之为“旷代逸才”。随后，“筹安会”派出大批专员到全国各地进行活动，并通电全国，要各地文武官员和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“讨论国体”。各地文武官吏无不阿从附合。过了几天，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：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决议，“一致主张君主立宪”。筹安会经过这一道手续后，便想由袁世凯做起皇帝来。后又觉得这样做不妥，还是经过一道参政院的手续，因为参政院是“代行立法院”，它可以为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而完成

立法手续，以欺骗人民。于是，各省进京的代表摇身一变而成为“各省公民请愿团”，由筹安会代草请愿书，这些请愿团的领函人如段芝贵、曹锟、姜桂题等都是袁的忠实爪牙，准备向九月一日开会的参议院请愿。与此同时，袁的策士梁士诒、朱启钤等，唯恐失去攀附良机，积极收买各方，在北京策动成立各种请愿团，与筹安会争功夺宠。霎时间，北京出现了什么“商会请愿团”、“孔社请愿团”、“人力车夫请愿团”，以至“妓女请愿团”、“乞丐请愿团”等等，无奇不有。袁世凯就是依靠这批乌七八糟丑类的滑稽表演，来表示“人们”对帝制的“热情”。同时，也说明了帝制运动的真实政治内容，是乞丐式（娼妓式）的政治，这些人不过是袁氏收买下的一批政治乞丐和政治娼妓而已。

九月一日，参议院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，许多参政大员，如杨度、梁士诒等本人就是帝制派，他们原准备举手通过帝制，好让袁世凯尽快黄袍加身。可是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感到这样做还不十分稳妥，怕生枝节，感到还需搞一个征求“民意”的机构，在更大范围内搞一场假民主的骗局，给他当皇帝披上一件民主合法的外衣。于是，梁士诒秉承袁世凯的旨意，又拼凑起一个“全国请愿联合会”，

于九月十六日向参政院上第二次请愿书，要求召开国民会议，解决国体。参政院立即请袁下令于十一月二十日召集国民会议，议决国体。

袁世凯制造“民意”的目的有两个：一是为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反对；二是向帝国主义各国显示自己得民心，统治稳固，以便取得各国对袁氏新王朝的承认，特别是要取得日本和英国的承认。当袁世凯取得英、日两国对帝制承认后，以为外交上有了把握，要爪牙们放手大干，加速实行帝制的步骤。于是，梁士诒等人指挥“全国请愿联合会”，向参政院上第三次请愿书，说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太繁杂了，要求参政院以“立法贵简，需时贵短”的精神，另设机关，征求民意，以定国体，而固邦基。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，于十月六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，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，选出国民代表，组成国民代表大会，“决定国体”。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的咨文后，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，并命令各地文官武将保全地方治安，镇压反对帝制活动，为变更国体作好准备。

袁世凯为了早登帝位，在党徒们的精心布置下，以国民会议事务局的名义，密电各省，指示各地“代表”要一致赞成君宪国体，要物色可靠人充

当代表，名义上由选举人选出，实由各省军民两长指定。十月二十五日，在全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。各省陆续在将军或巡按使署内举行国体投票，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监督人。其票面只印“君主立宪”四字，令投票人写上“赞成”字样。十一月二十日，全国投票结束，由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，负责汇查票数。十二月十一日，参政院开会报告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，赞成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，没有废票和反对票。各省的推戴书都按北京的密电一致写着四十五个字：“谨以国民公意，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，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，承天建极，传之万世。”接着，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推戴书，当众朗读，全体一致通过。当天中午，袁世凯接到参政院的推戴书后，认为推戴书没有为他背信弃义进行洗刷，假意推让，立即发回。按照预谋，同日下午，参政院又开会通过第二次推戴书，吹捧袁有经武（练新军）、匡国（屠杀义和团）、开化（办新政）、靖难（绞杀辛亥革命）、定乱（镇压二次革命）、交邻（承认二十一条）等六大“功烈”。不仅“功烈”“迈越百王”而且德行也“夔绝古初”。因此，“今则国民出于公意，戴我神圣之新